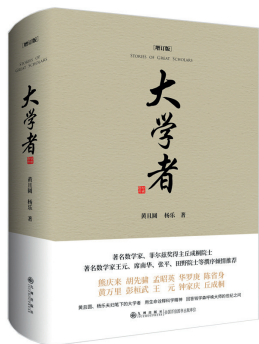


怀念我的老朋友杨乐、黄且圆伉俪

丘成桐



《大学者》（增订版）

作者：黄且圆 杨乐

出版社：九州出版社

出版年：2024

杨乐院士是我在国内最要好的朋友。他不幸于去年过世了，他的妻子黄且圆则早他十年离去。她生前所写的文章在她去世后集结出版为一本名《大学者》的书。最近，钟秀斌先生计划将这本有关学者的传记，加上杨乐讨论中国数学史和数学教育的重要文章，汇集成书出版。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事，我非常赞成，深感欣慰。虽然公务繁忙，百事缠身，亦抽空为文，抒发一些个人感受。

1979 年暑假，我应华罗庚先生的邀请，初次到北京访问。华先生是我久仰的学者，他刚巧出国，故由他的学生陆启铿先生接待，而众所周知陆先生腿不方便，因此接待的任务便落在杨乐身上。

前一年，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。伍鸿熙刚作为美国科学院考察中国近代数学进展的考察团成员，了解到杨乐和张广厚在复变函数值分布的杰出工作。承他转告，才知杨、张大名。当时经过传媒的广泛报导，杨、张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我在北京时，看见小孩子的课本上写着“向杨乐张广厚叔叔学习”的口号。1987 年秋天，我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当教授，所里的教授都是大师级的人物。我跟 Borel 教授开玩笑，说在中国知道您名字的

人远远不如杨乐的多，没想到 Borel 教授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几年之后，杨乐到高等研究院访问我，我没敢在 Borel 跟前引见他。

杨乐急公好义，相识满天下；兼又心思缜密，处事圆融。根据个人经验，一切事情经他安排，没有不圆满解决的。

1979 年第一次回国，改革开放刚刚开始，不容许自由走动。我提出回家乡蕉岭看看，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始能成事，又说服了王光寅随行，一路尚算顺利。

1980 年，陈省身师在北京召开双微会议，各类人事复杂，端赖杨乐兄居中调停，会议办得十分成功，令人佩服。

杨乐伉俪都体现了传统读书人的优点，那就是丹心为国，忠厚对人。我先在北京认识杨夫人黄且圆，但是交谈不多。1980 年代她访问康乃尔大学，我刚巧也在。她古道热肠，为一位熟悉的留学生问了我很多问题，那个学生叫励建书。我介绍他去跟我的朋友 Roger Howe 做研究，励建书毕业后，去了香港科技大学当教授。以后当上院士，杨兄大概投了赞成票吧。

华罗庚先生去世后，群龙无首。杨乐的学问为人得到大家认可，数学所和后来的数学和系统科学研究院的行政事务逐渐由杨乐处理。我在中国几十年来的工作，都是通过杨乐完成的。

打从 1980 年起，我每年都回国，都由杨乐接待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得到菲尔兹奖后，胡耀邦总书记接见，交谈甚欢，超过预定时间差不多一个钟头。会见后，杨乐赶着送我到机场，时间十分紧迫。到达机场时，飞机还有半个钟头就要起飞了。杨乐

将他的证件拿给卫兵看，卫兵得知他是模范英雄，当即立正，举手致敬，并让我直奔机舱，我将行李留在北京，终于赶上了飞机。经过这一次，我才知道杨乐在人民眼中，地位是何等的崇高！

我从1979年到1984年都在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，来访的内地学者络绎不绝，其中钟家庆是最重要的一位。他和莫毅明跟我做复几何，完成了几项重要的工作。杨乐和钟家庆是老朋友，他在访问普渡大学时，还特意飞到普林斯顿来会面。当时我家人在加州，我独自一人住在研究所提供的公寓。三人聚餐，杨乐下厨，烧了一道可口的鲤鱼，真没有想到他的厨艺那么出色。

不久传来噩耗，钟家庆在纽约心脏病发猝死，中国丧失了一位刚露头角的杰出学者。我对钟的期望甚为殷切，他的去世使我很多要在中国做的事情成为空谈，可谓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了。后来杨乐成立了一个以钟命名的数学奖，足见他对朋友的赤诚。

我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（UCSD），尤其到哈佛以后，每年接待大量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，自然碰到了不少问题，杨乐给了我很多帮助，有时甚至不远千里来帮忙。

1992年中国科学院遴选海外院士。在杨乐的努力下，陈省身先生和我都成为第一届外籍院士。当时杨乐是中国数学会会长。中国数学学会在清华大学开会时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路甬祥特意到会场给我颁发证书。我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数学应该如何现代化，路院长听了之后很激动，请杨乐和我们三个人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筹办新的数学中心。1996年，通过从香港筹得的捐款，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晨兴数学中心。中心创立前后，总是受到误解，杨乐和我成为被攻击的对象，历久不息！包括反对我们召开华裔数学家大会。我身在海外，冲击较小；杨乐一夫当关，排除万难，大会最终成功召开。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亦成功运作，以开放的形式

培训中国各地研究尖子。中国好几个数学方向的现代化，皆溯源于晨兴中心。今天回顾，杨乐居功至伟！

从上述的事例中，可以看到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，进退谦让，处事英明，而在紧要关头，却能坚守原则，岿然不动，为国家为民族作育英才，杨乐兄真可谓国士无双！

1996年中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，杨乐居功至伟。我的朋友 Lennert Carlson、David Mumford、陈省身先生和我都做了不少工作，但是中国领导人的意见至关重要，杨乐和路院长代表国家，他们的角色非同小可！

杨乐虽然名满天下，但是他很低调，从来不吹嘘自己的工作，也不大和传媒打交道，因此引起很多误解。但是君子坦荡荡，在院士选举时，对于学术上够水平即使在其他方面给他造成很多麻烦的人，他都会公允地评估投赞成票。

进入21世纪，杨乐认为自己年将六十，数学院院长之位理应让贤，我力劝不果。

现在谈谈杨乐夫人黄且圆这本书。她从1990年代开始写作，她父亲是一位极有风骨的水利学家。她写父亲的文章，自然是情感洋溢，文采斐然。而她描述陈先生和我的文章，却使我欣慰。坦白说，陈先生生前和数学所关系一般，我以为杨乐夫妇对陈先生心里总会有些意见，可是文章丝毫不带月旦之意，反之生动自然地写活陈先生爱国爱数学的个性，文章的确好，难怪陈先生生前也很喜爱。

杨乐和我45年老友，心意相通，砥砺扶持，携手共进，很多事情，不是三言两语可尽的。以上约略说来，但望读者能一窥亡友的风骨，余愿足矣。

谨以此文献给老友夫妻在天之灵。🍀

丘成桐于清华大学

二零二四年五月

【本文为丘成桐先生为《大学者（增订版）》（黄且圆、杨乐著，九州出版社，2024年）一书撰写的序言。】